

高教参考

2021年第5期

华北电力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

2021年5月12日

高等教育评价改革（一）

■ 专家视点

钟秉林：新时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评价导向

王义遒：改革教育评价，需要发展素质教育

周 川：量化评价的泛滥及其危害

张东海：破“唯论文”应以贡献作为学术评价的取向

■ 改革动态

破“SCI至上”，高校科技成果奖亮点纷呈

■ 专家视点

钟秉林：新时代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评价导向

“十四五”期间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键是明确普及化阶段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评价导向。

第一，强调分类发展的高等学校评价。普及化阶段的高等学校评价要强调分类发展、分类评价，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人才的多样化需求和个性化的高等教育诉求。“双一流”建设高校注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推进基础学科和关键技术领域的知识创新；应用型高校与高职院校注重培养大学生的专业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师范院校注重培养高素质教师，满足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师资需求。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成效评价也应探索分类评价，坚持一流目标和需求导向，重视管理体制与治理体系改革成效评价，探索成长性、特色性发展评价。

第二，强调师德优先的高校教师评价。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建设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关键。一是强调专业素养与师德素养的综合性评价，尤其注重对教师师德素养的评价；二是将人才培养放在教师绩效考核评价的重要地位，将教书育人、崇教爱生作为高校教师评价的重要标准；三是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四是关注教师角色的转变，适应新兴信息技术发展，从评价教师知识传授结果转向评价教师作为大学生学习活动设计者和指导者的工作成效。

第三，强调综合发展的高校学生评价。从注重知识的一维评价向注重大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评价转变。一是注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成效评价，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怀和综合素质；二是注重大学生学习结果及成长体验评价，基于学习结果和用人单位满意度反向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引导大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发展；三是注重以课程建设、专业建设为核心的教学质量评价，为学生成长提供坚实保障。

第四，强调贡献增值的学科评价。学科评价要关注内涵、聚焦贡献、突出特色。人才培养促进学科建设，学科建设反哺人才培养，因此，学科建设成效评价也要突出人才培养的地位。同时，注重问题导向，将水平评价与效益考核、日常动态监测与周期评价、定量评价与

定性评议相结合，增强评价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重视学科整体发展水平、成长提升程度及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价。

第五，强调效率优先的高校内部质量评价。坚持学生中心、结果导向、持续改进、多元参与的评价理念，要明晰质量标准，优化指标体系、创新评价手段、完善持续改进工作机制、健全组织制度保证、加强质量文化建设，构建高校内部质量监控和保障体系。要合理运用结果评价、过程评价、增值评价、综合评价等评价方式，提高质量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有效性。（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摘编自《中国高等教育》2021年第1期）

王义遒：改革教育评价，需要发展素质教育

目前世界上发布大学排行榜的机构基本上都是通过市场化运作的。其目的固然有为大学教育提高水平做参考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为学生提供升学咨询以谋取商业利益。这些排名都是通过对各项办学指标评分排出来的。指标中有一些是主观印象分，而绝大多数都是根据各校提供的数据进行量化评分处理的，如科研项目、经费与获奖数、发表论文与被引用率、生师比、教师中获得高学位者的比例、毕业生的薪资收入、学校的总资产与总收入等。在不同排行榜中，这些项目与权重的选择会有不同。这些定量指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反映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但都充满着“五唯”成分，绝非精准衡量。大学作为一个文化单位，它对社会、国家乃至人类文明进步的贡献远非用量化指标来衡量。以量化指标为基础的排行榜鼓励急功近利，对于强调“板凳需坐十年冷”的基础研究是很不利的。

面向未来的发展，我国大学不宜用“从跟跑、并跑到领跑”或“弯道超车”等言辞来表述，而是首先要做“开路先锋”，闯新路，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到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情况下，可能发生少数社会精英控制垄断智能工具，多数人却成为智能工具的俘虏而趋于“弱智化”，从而造成社会分裂甚至对立的现象。高等教育要为应对这种状况的发生做好充分的准备，真正在提高人才素质上下功夫。所以，落实评价改革是发展素质教育的一个抓手，两者互相促进。所有这些都要求我国大学甩掉排行榜这

根“指挥棒”，认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真正建立起以立德树人为主旨的新时代教育评价体系，发展素质教育，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第一，要把“破”大学排行榜作为改革教育评价的切入点。决不能将它作为办学的指挥棒。第二，针对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认识时代特征，给学生塑造时代精神。第三，发展素质教育就不能将学生限制在校园里“发展”，要充分体现企业、科研院所、政府机构等社会组织在协同育人方面的作用。第四，一批新科技新产业的发展，如人工智能、云计算、自动控制、机器人、量子技术、基因工程、脑与神经科学、空天科技等，将会对人类未来产生非常不确定、不可预测的影响。如何应对新科技对人类命运的挑战？素质教育工作者要将科技伦理与科学史教育提到重要日程，并将它作为发展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第五，新的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工具会对素质教育带来千变万化的场景和丰富多彩的教育效果。如何充分利用这些工具做好素质教育工作，需要不断探索。第六，素质评价既是素质教育的一个大难题，也是教育评价的复杂问题。从教育过程很难完全预见被教育者的素质结果。对学生不断地灌输某种高尚理想，而学生的行为却反其道而行之的事例屡见不鲜。所以，怎样推行发展素质教育，使学生受到深刻的、长远的、一辈子的正面影响，是一个值得不断探讨的课题。（作者系北京大学原常务副校长）

（摘编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2021 年 4 月 2 日）

周川：量化评价的泛滥及其危害

高校量化学术评价的泛滥，表现为一是量化评价政出多门、数量过多。二是简单量化、指标蛮横。三是指标体系易变多变、反复无常。四是评价结果与名利挂钩太滥。量化评价只是高等教育评价的一种具体方法，在某些特定条件下有其特定的用处，然而，量化评价在高校的泛滥，却对高校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危害。一是颠倒内容与形式、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导致评价结果不公平；二是抑制了内部动机，将学术研究直接导向庸俗的外部动机；三是评价权力从同行专家转移到管理部门，使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之上；四是教师身心俱疲、多级分化，职业尊严和学校忠诚严重降低；五是“唯课题”的危害远甚于“唯论文”。

量化评价的泛滥不是偶然的，也不单单是高校管理层面的问题，而是有其特定的背景，有其深层的观念和体制根源。一方面，量化评价的盛行与高校绩效工资制度有一定的关系。绩效工资主要适用于那些易于计件衡量、周期较短的工种，也并非任何企业、任何工种都可以不加区别地采用。高校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学术组织，它的整体水平和成就根本就不可能以排出名次来表达。各种大学排名榜无非就是根据自订的而且是屈指可数的几项学术指标，对复杂无比的大学计分并一一排出名次，是比较典型的以蠡测海、以偏概全，内在的片面性、荒谬性早已广受诟病。更可疑的是，绝大多数大学排名榜及学科排名榜都是由商业性机构操纵的，商业性机构自然要按照商业规则来运作，它本质上是商业行为，与学术的本性格格不入，因而商业性的大学排名对高校来说实在是一件非常凶险的事。另一方面，量化评价的泛滥也有体制上的原因，与高校管理的过度“行政化”有很大的相关。高校教师的学术评价，如此复杂和专业而且又利害攸关，当属学校的“重大事项”无疑，然而就是这么重大的事项，在许多高校里却完全是一个行政的行为，从指标制定，到政策“解释”，再到推行实施，基本就是行政领导和职能部门在主导和操作，整个决策和运作的过程，既缺少起码的论证，也缺少必要的民主程序，学术委员会、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形式不是被甩在一边，顶多也就是“审议”走过场，根本起不到制约作用。

高校学术评价的改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配套复杂，可以说千头万绪，但在千头万绪之中，有一个首要的问题需要明确，那就是“由谁来评”的问题，也就是评价主体的问题。只要把这个首要的问题解决了，评价的具体方法和技术问题也许就可以退居其次，就基本可以交给有资格的评价主体自己去决定了。而要解决这个首要问题，恰恰涉及办学观念和管理体制的诸多方面，因此突围的关键仍然在于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在于“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行政化管理模式”，在于真正实现高校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作者系苏州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

（摘编自《江苏高教》2021年第5期）

张东海：破“唯论文”应以贡献作为学术评价的取向

“破五唯”自上而下的议程设置使高校以执行者的角色出台各自的“破五唯”措施。然而，倘若未能事先明确可行的替代方案，会使高校学术评价面临失去依归的风险。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不仅应明确学术论著在学术评价中的地位，更应为学术论著评价设计评价标准和操作规程。

首先，破“唯论文”倾向并非在学术评价中将学术论著弃置不用，学术论著作为学术场域一般等价物和学术评价核心标的物的地位是科学共同体一致认可的，它不仅是科学发现的发布方式和学术交流的平台，也是学术贡献的认可方式和学者个人学术声誉的来源。所谓破五唯，一是要明确学术论著作为评价标准的适用范围，作为一种学术评价标准，学术论著应运用在对学术单位、学术人员的学术业绩与学术水平的评鉴中，将论著评价撤离与学术活动关系不甚密切的诸如研究生招生名额分配、研究生评奖评优、研究生答辩资格审查等领域，使之回归学术贡献与学术水平评价本位，避免将论著评价作为各种甄选的政策工具。二是要纠正学术论著在评价标准中一家独大，乃至成为评价结果唯一影响变量的倾向，例如在学科评估中除学术论著体现的科学研究水平和贡献外，应重视学科在优质人才培养、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等方面的贡献；在职称评定中要重视教师在实现立德树人这一高校根本任务中的贡献，在对教师教学业绩的评价中淡化基础教学量的刚性要求，重点考察教师在人才培养制度改革、课堂教学方式革新、课堂教学效果提升等方面的措施与贡献。三是在学术论著评价中要破除以数量、刊物（出版社）层级等外在形式作为评价依据的KPI主义，抛弃精确定量的评价方式，把论著所体现的贡献和研究水平作为评价的主要依据，通过对论著的内容分析，考察学术论著对于人类知识增长、前沿科技突破、重要技术创新以及其他关乎国计民生、社会治理、文化创新等问题的认识与解决的实质性贡献。

要破除论文数量迷局，推行代表作制度不失为一个良好策略。论著代表作在作为评价材料提交评审时，已然经过期刊社（出版社）及其评审人、作者本人以及时间维度上的学术影响力等多重检验，基于代表作的学术评价可以使评审过程更多集中在对论著内容所代表的学术水平与学术贡献进行评价，免于论著发表数目等变量的干扰，因

而代表作评价能够较为准确地识别评价对象的学术水平与学术贡献。推行代表作评价制度，可以使高校教师从论著生产的烦琐考核中解脱出来，精心地选择研究问题和组织研究，力图做出最有价值、最有代表性的研究，从而达到引导教师从事高质量研究的目的。尽管实施代表作制度难免导致总产出的降低，但这是提高研究质量与贡献的可承受代价。

落实代表作制度，需要进行相配套的绩效考核制度与绩效激励制度改革。对教师的绩效考核不宜过频，淡化年度考核的终结性评价性质，允许教师以研究内容和研究过程描述作为年度考核材料，为教师投入周期较长的高质量研究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教师工资、绩效激励不宜与论著产出数量密切挂钩，应以普惠式生活保障为主要目的，使教师不致为挣工分而片面追求论著数量。破除“唯论文”倾向，还应改进评审制度。当前主流的同行评审制度，无论是会议评审、无记名投票的审议制度，还是匿名通信评审制度，其决策过程都颇为隐晦，当事人与旁观者无法判定评审者是基于怎样的考量做出评议决策，也无从监督评审者是否基于论著学术价值做出自己的判断。可否考虑将关涉教师发展核心利益的学术评价（如职称评定）从封闭式会议评审改为开放式评审，借鉴学位论文答辩的某些形式，由评审者和被评审者就论著的具体内容、学术贡献和学术水平进行公开的陈述、辩论与评价。在通信评审环节，有条件的高校或学科，亦可考虑引入国内国外双重通信评审。（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摘编自《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2期）

■ 改革动态

破“SCI至上”，高校科技成果奖亮点纷呈新时代

近日，多所高校公布了2020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的获奖结果。据了解，本次授奖共确定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和青年科学奖授奖项目与人选近300项（人）。在全国各界积极落实教育评价综合改革方案的大背景下，备受关注的本次高校科技成果奖励评审工作，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修订提名书，破除“SCI至上”

作为本次高校科技成果奖励评审工作的一条主线，“破‘唯论文’”始终贯穿了本次科技成果奖励评审工作的始终。为扭转以“SCI”指标为科研目标的异化现象，本次奖项评审修订了提名书，自然科学奖和青年奖“代表性论文”填写数量从8篇减到了5篇；自然科学奖和青年奖不再要求在“代表性论文目录”一栏填写“影响因子”，“SCI他引次数”也改为“他引总次数”。

中国科技评估与成果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李志民表示：“高校是国家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主要阵地，但长期以来，科技评价活动中‘只看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的这种简单化、一刀切的评价模式延伸到高校，就变成将论文数量与毕业考核、职称评定、资源分配等直接挂钩，甚至将论文作为评价一切学术活动的标尺，滋生、助长了只重视论文发表而忽视创新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唯论文’不良取向，严重异化了高校师生进行学术研究的目的，甚至诱发各种各样的学术不端。”

扩容专家库，最大程度回避圈子文化

为杜绝项目评审过程中“找熟人”“拉关系”现象，最大限度减少人为因素干预，本次高校科技成果奖评审工作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建立了由校外专家参与的同行评议制度，提高了奖励评审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客观性。此外，本次评审还要求评审专家签订承诺书并采用专家与项目系统自动匹配的网络评审机制，实现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据了解，教育部科技司很晚才公布评审专家的名单，评审过程中会把专家手机等通讯设备收走，评审区域也实现封闭管理，目的就是保障奖励评审的公平公正。

面向国家需求，推动科技工作转段升级

本次授奖项目还有一个亮点，授奖成果确实聚焦于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其中基础研究学科获奖总数增多，对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基础学科的评审名额予以倾斜，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较上一年度增加20项，增幅达50%；涌现出一批如“非紧完备流形上的几何分析”“光学超晶格中纠缠光子的产生、调控和应用”等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原创成果。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则主要聚焦制约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and 国家安全的瓶颈问题。

（摘编自《中国科学报》2021年5月6日）